

论文学译者的创造性

赵小兵,马冲宇

(河北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摘要:文章论述了文学译者的创造性。文学翻译是译者的审美再创造活动,是译者的语言艺术再创造。文学译者是文学译本的再创作者,文学译本中渗透着译者的审美情趣和精神力量。译者重塑文学语言和重写文学译本的艺术再创造,使文学原作的生命得以在新的语言环境中存活。

关键词:文学翻译;译者;审美再创造;文学语言重塑;文学文本重写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0)05-0129-06

“主体性无疑密切联系着创造性:主体性的体现和发挥全在创造性,创造性离不开人这个主体及其主体性”^[1]。可以说,译者主体性最重要的体现就在于创造性。关于翻译的创造性,已经有许多论文和专著论述过这个问题。笔者力图做出新颖的论述,并运用洪堡特“语言的创造性”原理和巴赫金的文本理论,从译者发挥学识和文学素养,实现文学文本的审美感知,理解和生动再表达等方面来谈译者的创造性。简言之,译者的创造性主要体现在其语言能力、领悟能力、文学修养、审美能力等方面。文学翻译行为渗透着译者的精神与个性,文学翻译成功与否,关键在于译者的文学修养和创造性。译者依据文学文本再创造一个新型文本,使文学文本中的语言以另一种语言(文学语言)的面貌存“活”,并赋予新的生命,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创造。

一、文学翻译是译者的审美再创造活动

文学翻译首先要求译者充分理解文学文本,要能审美地感知到作品的内容,并进一步用文学语言生动形象地再表达出来,保持语言的新鲜感、美感和“媚”感^[2]。译者在解读文学文本时具有主观性,但是,批评家会指责译者没有理解原意。有时的确可以知道译者是否真的理解了作品的意思,对作品的审美把握是否到位。这看似简单,却不只是一个语言问题。从支谦《法句经序》中的“名物不同,传实不易”开始,继而道安的《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所说的“五失本”、“三不易”,以及后世译者慨叹翻译不易的声音不绝如缕。翻译之难,最难的第一关就是“传实不易”、“愚智天隔”。译者以有限之身实现跨越时空距离的理解与传达,必须具备相当的学识才行。况且,文学文本中涉及到的知识范围包罗万象,变化万端,作者写作时可以如天马行空,任意发挥,展开天才的想象力,而译者则要越过时空的距离对作者之意、对作品中的语言达到审美的把握和准确的理解,实属不易。文学作品的语言其审美特点包括四个方面,即音乐性、形象性、含蓄性与情感性^[3]。此外,译文的表达则是最考验译者的功夫的,译者必须具有能写作的才能和天赋,至少具有按照文学文本重写另一种文学语言的能

收稿日期:2008-06-14

作者简介:赵小兵(1968-),男,四川渠县人,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系教师,博士,主要从事俄语、翻译

欢迎访问重庆大学期刊社 <http://qks.cqu.edu.cn>

力,做到“随心所欲不逾矩”。要达到一种高超的驾驭语言的技艺必须要有语言才能和天赋。当代译论家多有慨叹,例如思果说:“我不免想,智慧比原作者低得多,文字的修养训练比原作者差得远的,怎么能翻译那人的作品?常人翻译天才作家的作品,结果只有逐字死译,杀死原作者,把活凤凰译成丑小鸭!大多数诗的译作都毁灭了原作的音乐和词藻,古今中外一样。有的佳译是新创作,不是人人做得到的,中国的词曲,英国的民歌,都是要唱出来的,译作又怎样唱法?——要可以唱,就要另创旋律。译者不仅要写作,根本要创作。”^[4]在文学翻译中如涉及到对原意的追寻和考究,需要遍查资料,有时仍不可得。严复说的“一名之立,旬月踟躇”。这不是花时间就能一下子解决的事情,它需要学识,以及在学识基础上的灵感发现,这不能说不是创造,至少是创造性的劳动,偶有所得,堪与诗人寻章摘句相比。

更有意思的是,文学文本是一个意义开放的系统,决不能一次性地用一种语言完全地表达出来,一经表达,便渗透了译者的主观性,就走样,无法保持凝止不变。思果说:“诗不能译,译就是毁灭,已经是老生常谈了。译者只能再创作,把一首诗用另外一种文字重新写出来。音调、韵律、辞藻是诗的生命,一经翻译,就烟消云散了。只有另创音调、韵律、辞藻。不过这已经不是翻译,而是创作。”^[4]文学翻译是在艺术的领域里做事情,要跨越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的距离而实现传通和交流,这需要译者的再创造。这里需要解决“抗译性”的问题。译者凭借自己的审美理解,以及对译语环境中读者心理和接受基础的把握,为了实现一个文学作品在异语、异域文化环境下的被接受和传播,必须懂得翻译“增”、“减”的艺术,懂得平衡的艺术。王国维评辜鸿铭英译的《论语》和《中庸》说:一是“过于求古人之说之统一”,二是“全以西洋之形而上学释此书”。“前病失之于减古书之意义,而后病失之于增古书之意义”。郑海凌教授说“这里的一‘增’一‘减’,实质上是中西文化的对话与交流”^{[5]223}。这正是译者把握语言和文化差异所做的创造性的重写。既要实现审美和文化的传通,又要达致理解,译者不得不做变通处理,不得不进行适应性重写。这个重写的本领,好比写文章一样,它需要准确地把握,精致地揣摩,细心地平衡,需要长期的磨炼和适应过程。另外,文学翻译亦涉及译者的文学修养和艺术才能,译者须具有敏锐的语感和美感,古人将“天见人,人见天”改为“人天交接,两得相见”,“辞旨如本”,“质”而能“雅”,“破例加以文饰……放宽了尺度,美化了译文,文学翻译之

‘道’得见端倪”^{[5]213},从而达到一种艺术创造的境界。文学翻译是一种艺术,译文须具有艺术感染力,使人读后深受启发。为什么一个文学文本过一段时间需要重译,就在于在当时的环境下,为了更好地被译语文化环境中的读者所接受,译者作了变通处理,进行了创造性的重写,因而使文学文本的意义得以显现的同时,又可能增加原作所没有的东西,或者损失原作中的某些内容。有时候时代一变,风气更新,被遮蔽了的文本意义从文学文本中显露出来,清楚地显现在新的一代学人面前,因而一个文学文本就有必要进行重译,进行新一轮的再创造。

黄振定说:“德里达认定,翻译恰如有人(指本雅明)早指出的,就是通过转化原文来赋予原文以生命,翻译的使命就是通过使语言延伸(‘延异’和‘播撒’)来保证语言‘活下去’,‘活得更好’,活得超出原作者之外。因为恰如一般所谓‘生命’就在于‘活下去’、‘活着’,语言的生命也就在于如此破坏性的翻译活动,它是整个语言存在、语言世界的生命延续。活动、破坏、差异即是存在和意义之所在!这正是解构主义的真谛。”^[1]正是译者的创造性,有时甚至是“破坏性”的翻译行为,使得文学文本在另一种语言中得以再生,有时确实并不清楚是否传达了原作品之意。“但其实德里达是坚决否认‘人’的因素的(为了彻底打破传统形而上学)。一切只有语言自身的‘游戏’、‘撒播’、‘延异’,其中决无翻译者的作用。所谓翻译活动类似‘背负重物’‘艰难行进’,既不是什么形式载有内容和意义,也不完全是语言自身的事情而与译者无关”^[1]。黄先生在指出德里达的深刻和片面性之后继续分析,德里达的“延异”、“撒播”毕竟有链条状、蔓延状,有依附性和延宕性,翻译也至少有个“接合性”的问题。黄先生援引根兹勒的话说,德里达毕竟肯定翻译不是求得与原文意义相似,而毋宁是一种爱的运动,充分详细地把原文的意向方式传入自己的语言。因此,语言中确有解构主义无法否认又与其主旨格格不入的东西,尤其是人作为语言之源,译者作为翻译行为的操作者,可以充分发挥其主体能动性。译者在新的语言文化环境中,考虑读者的接受基础和需要,用一种新的语言创造地构建出和谐的新文本,它离不开译者的语言能力和精神参与。每一次翻译行为就是一次创新,是唯一的、不可重复的行为。文学译者是一个创造者,理应使文学文本在新的语言和文化环境中焕发出新的生命。笔者拟运用洪堡特的“语言创造性”原理和巴赫金的文本理论,来进一步阐明文学译者的创造性。

二、文学翻译是译者的语言艺术再创造

翻译是极其复杂的过程,涉及许多因素,但最基本、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是语言,尤其是文学翻译,更是一种重写文学语言的审美行为。文学翻译是一种艺术化的语言活动。我们将翻译主要看成一个行为过程,将文学翻译看成在另一个语言文化环境中实现文学文本的交流与沟通。洪堡特将语言看成一种活动,而决非产品,他说:“语言就其真实的本质而言,是某种连续的、每时每刻都在向前发展的事物。语言绝不是产品,而是一种活动。”“我们不应把语言视为无生命的制成品,而是必须要在很大程度上将语言看作一种创造……”“语言是一种精神劳动。”^{[6]55-57}洪堡特所说的“语言”,实际上可以看成言语行为,文学翻译就是一种复杂的审美交际的言语行为。译者首先是一个双语使用者,译者对文学文本的翻译,即实现文学文本在另一个语言环境中的生命延续,洪堡特将语言视为一种活动,无异于强调了语言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一部作品如果不被阅读,就不能成为当下的作品,如不被翻译,永远也实现不了在异域的传播,译者运用双语能力和审美情趣,为达到文学沟通和交流的目的,将文学文本中的意义发掘出来并重写文学语言,这是一种审美交际的创造性言语行为,译者赋予文学文本以新的生命。在洪堡特看来,语言是“一种积极作用的力量”,因被使用而产生意义,它“对精神产生有力的、生动的影响”,语言具有巨大的创造力和影响力,它本身就是一种创造精神的工具,但这种创造离不开人对语言的使用。因此,文学翻译作为一个语言艺术的创造过程,可以作如下理解:每一次文学翻译行为都是具有高度审美意义的言语活动,是“精神不断重复的行为”,是在复制思想、精神和情趣中探寻世界意义和生活的真谛,是一次探索文学作品意义的再创造行为;既然“语言的真正定义只能是发生学的定义”,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翻译行为,就是连续不断、永无止境地生成意义的言语活动,意义不是固定在文学文本中的,而是处于一个动态的、开放的状态。在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的知识修养、审美感知和精神意趣等不断地渗透到其双语活动之中,促使意义的生成。

洪堡特在论述语言时,还谈到了精神力量的继承问题:“在研究语言时我们不可避免地会置身于历史进程的中心,我们会发现,为我们熟知的任一民族或语言都不能被视为初始的开端。由于每一语言都从生活于不为我们所知的史前时期的先民那里继承了材料,所以,生成思想表达的精神活动始终跟某种

既成的材料有关,它并不完全是在创造,而是在进行改造。这种精神活动是以一种恒常不变的、相同的方式进行的。因为,它的源泉是同一种精神力量,这一精神力量仅仅在不十分广的一定界限内发生变异。这种精神活动的目的是相互理解。”^{[6]57}文学翻译正是基于既成的文学作品而筹划意义的言语活动,它不同于原创,但又具有明显的创造性。如果说作家创作是在收集素材的基础上,自由地建构(虚构)语言,那么,译者的创造则更多一些限制,主要不是自己创造,而是创造性地建构新的文学语言,使文学文本中“既成的材料”重新活现在文学译本之中,使文学文本的语言在译本中得到复活和延续。虽然文学翻译是一种创造活动,却是一种可预见的有规律性的意义生成行为,因为原作成为了创造的材料和依据,在原作中能寻出意义的“踪迹”。这是不同于创作的一种再创造,虽然在换易言语的过程中会导致意义的细微变化,涵义会呈现出细微的差别,但却具有某种共通的东西,那就是能在文学文本中找到它的踪迹。

文学翻译活动是否成功,关键在于译者。译者通过对文学文本的语言进行审美感知来筹划意义,但译作的面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的语言能力,以及知识、修养、精神、趣味等。在翻译中还存在着另一方面的创造,也是直接与译者的精神个性相关的。翻译终究是语言生成、发展的过程,北宋赞宁在《宋高僧传·译经篇》卷一开篇之“系”(作者对该篇的评析)中,开宗明义地概括了翻译的性质:“译之言易也,谓以所有易所无也。”这句话即揭示了在翻译过程中从无到有的语言和意义创新,必定会因为语言的创造性而产生新的东西,文学翻译为译者提供了表现其精神个性的空间和自由,于是文学翻译行为就是浸透着译者生命能量的意义生成活动。洪堡特说:“精神特性的特点尤其在于,它的产品不仅只是人们赖以进一步构建的基础,而且蕴含着能够创造出产品本身的生命力。它的创造活动具有它自身也无法解释的性质。”洪堡特把人类语言的产生理解为生物发展史上的突变,把一种新语言的出现解释为语言发展史上的突变。在一种语言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的活动中,由于“精神特性”的作用,突变也随时地有可能发生^{[7]129}。这说明文学翻译在创造新的文学译本的同时,由于文学语言本身的形象性、抒情性、音乐性等和译者的精神个性的作用,势必会产生新的、奇异的东西,这是精神特性的表现。译者的精神个性是言语活动中非规律性的创造行为的根源。

每个人都可能进行创新,但创新的大小和性质有所不同,如果这种创新是由一个“天才”人物做出的,就会产生非同寻常的效果。文学翻译在组词造句方面,个人就享有很大的自由。句子结构和词语组合虽然有一定的规律性,但精当的表达并不能归因于规律的作用,而是取决于运用语言的个人。同样的一些词,由于被赋予不同的含义,或者重新调整其搭配,可以使语言获得某种独特的个性,通常人们所说的传神的功效,恐怕就在这里。一个人如果只是会正确地使用一种语言的“公有财富”,或者说只是懂得其语言规则,还不能说懂得了语言的运用,真正妙趣的语言可能具有某种奇异的形式,似曾相识又与众不同。Unger说:“只有当他(指运用语言的人)出于精神个性的需要,不由自主地投入语言创造活动之中,创造出新词新语、新型文本的时候,才称得上是语言‘天才’。”^{[7]129}文学译者是一个特殊的语言使用者,他运用语言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创新的过程,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说语言是无生命的东西,但它包含有生命的胚胎,具有潜在的创造性和生命力,遇到合适的使用者,“能够创造出产品本身的生命力”。一个高明的译者既是善于激活语言的创造性和生命力的人,又是一个善于驾驭语言的人,可以妙笔生花,趣味无穷,译作新意便由此而产生。语言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一个善于驾驭语言的人可以充分利用其财富。翻译家与作家一样,都需要有高度的语言审美能力和语言创造能力。

三、文学译者是文学译本的再创作者

文本问题也是与文学翻译行为相关的一个问题。巴赫金的文本理论对于我们理解翻译,理解文学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很有启发。文本(口头的和书面的)其所指接近于话语、表述、言语、语流等概念,强调的是作为连续话语整体的不可分割性,而语言是文本的基石和材料。巴赫金说:“每一文本的背后都存在着语言体系,在文本中与这一语言体系相对应的,是一切重出复现的成分,一切能够重出复现的成分,一切可以给定在该文本之外的成分(给定物)。但同时,每一文本(即表述)又是某种个人的、唯一的、不可重复的东西;文本的全部涵义就在这里。这指的是文本中关系到真理、真、善、美、历史的东西。对这一因素来说,一切能够重复出现的成分都只是材料和手段。这一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已超出语言学 and 语文学的范围。这第二个因素为文本本身所固有,但只能在情境中和文本链条中才能揭示出来。这一因素不是与语言体系的成分(可重现的成分)相关联的,而是与其他文本(不可重复的文本)相关联的,通过特殊的对话关系相关联。”^{[8]302}

这里强调的是文本中的“第二个因素”,即“某种个人的、唯一的、不可重复的东西”,“指的是文本中关系到真理、真、善、美、历史的东西”,它密不可分地存在于话语情境和文本链条之中。文本的全部涵义是由语言符号体系的手段来表达的。在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并不是简单地复制语言,而是在跨语境中重建文学语言和文本,以达到审美交流的目的。译者的每一次翻译行为就生成一个独特的译本,巴赫金说:“由主体来复现文本(如返顾文本、重读文本、重新上演、引用文本),是文本生活中新的不可重复的事件,是言语交际的历史链条中的一个新环节……任何时候也不能彻底翻译,因为不存在潜在的统一之文本。文本的生活事件,即它的真正本质,总是在两个意识、两个主体的交界线上展开……这是两个文本的交锋,一个是现成的文本,另一个是创作出来的应答性的文本,因而也是两个主体、两个作者的交锋。文本不是物,所以绝不可把第二个意识、接受者的意识取消或者淡化。”^{[8]304-305}

每一次翻译都是一次不可重复的事件。文学文本是作家心血的结晶,是“现成的文本”,而译作是译者“创作出来的应答性的文本”,文学翻译是一种再创造,不过是在跨语境中进行的与文学文本紧密关联的再创造。“文本不是(死)物”,而是“活物”,渗透了人的创造性意识,文本一经产生,就开始了自身的旅行,具有自己的生命历史。然而文学作品具有的“生命”犹如生活中的“美”一样,尽管常常可以让体验 and 感受到,但是不同的眼界却会呈现(显现)出不同的景观。文学译者是一个特殊意义的读者,它首先是原作的忠实理解者,更是一个文学文本的再表达者。哈吉姆(Hatim)说:“译者不仅具有双语能力,而且具有双文化的视野。译者在多种文化(包括意识形态、道德体系和社会政治结构)之间起中介作用,力图克服那些阻碍意义传译的不一致之处。作为符号在一种文化共同体里具有价值的事物在另一种文化共同体中却可能缺乏意蕴。处于一个独特的位置来识别这种差异并竭力消除这种差异的人,就是译者……一个经翻译的语篇反映了译者的解读……尽管普通读者可以在其创造性的解读过程中融入自己的信念和价值观念,可译者却必须保持更多的警惕性。在源语语篇中各种意识形态方面的细微差别、文化方面的各种倾向等,必须通过译者自己对现实的看法而得到全面的传递。”^[9]

文学译者在阅读原作的过程中,总离不开个人的领悟,蕴含在文本中的精神内涵不能作为“物”出

现,但它只能表现为符号而存在于文本之中,因此一个译者必须发挥其创造性,对原本进行深刻、广大和精微的理解,以便获得含意,建立一个新型文本,即一个能够延续文学文本生命的新文本。译者通过转化语言,创造性地显示意义,从而赋予作品以生命。

如果说原作是作者的表述,译作则是译者的表述,作者的表述通过译者的表述表现出来,译者直接成了作者的屏幕,透过译者的眼界,译语读者得以了解文学文本及其作者的思想情感,译者实际上成为了作者的合作者和代言人,作者则依靠译者而获得新生,原作依靠译作而被了解。作家写就一部作品之后,这部作品就成为读者和引用者的“他人言语”,译作则是“他人言语”的整体文本表现形式。隐蔽的、半隐蔽的、分散的“他人言语”等形式,即是不同的翻译形式,包括全译和各种变译形式^①。在译者的表述中包含有给定的东西(即公认客观化的内容),亦有创新的东西。译文不能完全属于作者,更主要应归属于译者。当我们读到巴赫金下面这段话后,对译者的创造性就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表述从来都不仅仅是在它之外先已存在的某种给定的和现成的东西的反映或表现,表述总是创造某种在它之前并不存在的东西,绝对新的和不可重复的且总具有价值(真、善、美等)的东西。但这新的东西总是从某种给定的东西(语言、所观照的现实、经历的感受、说话主体本人、他实有的世界观等)中创造出来的。一切给定的东西,全在创新的东西中得到变形。”^{[8]327}

文学译本是文学文本的变形和创新,这种“新的、不可重复的”译本是在语境转换中产生的,是译者对原本本的再表述。巴赫金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一文中说,话语的涵义完全是由它的上下文语境所决定的。有多少个使用该话语的语境,它就有多个意义^{[10]423}。这句话几乎与维特根斯坦说的“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一样深刻。语言的意义存在于它的用法之中,有多少种用法就有多少种意义。译者结合新的文化环境,用新的语言创造新的表述和用法,使译本保持和延续原作的生命。一切给定的东西要在新的语言和文本中再现出来,免不了会发生变形。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翻译有一种误解,误认为可以更换语言而不改变作者或原作的本意,翻译实际上被看了成机械的复制,其创造性的特性并没有被人真正认识清楚。一切全归结

于先已给定的东西,原本本是现成的,语言表现手段是现成的,作家的世界观是现成的,作家笔下的主人公形象是现成的。于是借助现成的手段,依据现成的世界观和现成的作家反映现成的对象,在翻译中一切都是现成的,译者就只有隐身,并变成透明的屏幕,才能实现翻译所要达到的目标,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原文中的一切必须在译者的主观体验和感知中被再度创造出来。巴赫金说:“打在引号里的话语(即令人感到并用作他人话语)和不加引号的同一个话语(或另一个话语)之间在他性的程度上(或被掌握的程度)存在着无数的级差,同说话者保持着不同的距离。与作者的话语层面比较,各种话语处于各种不同层面上,并保持着不同的距离。”^{[8]328}译者的话语与作者的话语处在不同的层面上,并保持不同的距离,如何适度地保持与作者的距离,这是一个动态平衡的问题,是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之间,在不同的读者之间,求得语义、语用上的和谐,有时候需要添加和补偿,有时候需要减省和忽略。文学译者对原作品的审美观照,其中渗透着译者的精神、志趣、立场、态度,更有译者新的体验和感受。文学翻译作为跨语言、跨文化的审美交际行为,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其创造性体现在对文学文本的理解和语言文本的重塑之中,体现在译者作为审美主体主动地筹划意义与突显表达。译者重塑文本的过程,并不是复制行为,而是一种新的表述行为,其中渗透着译者的情感倾向、立场态度和精神力量。如果把原作比作作家的单声语(文学文本是由作家本人创作的,其实作者只是让他笔下的主人公讲话,他自己则或远或近、或明或隐地跟着,他也在讲话,不过是在表达自己的思想和对主人公的评价态度等,严格地说原作不是独白的,不是单声语),那么,译作就是双声语,因为译者参与到了译文的再创造之中,译文中不可避免地会有译者的声音,或远或近,或高或低都能听到译者的声音。译作与原作形成一种对话关系,译者与作者也是一种对话关系。译作不是对原作的复制,而是发生了变形,译者也不是完全地躲在作者投下的阴影里,而是有所现身的,但又不能独自任意胡为。文学译本是一个综合体,译者深入到原作的各种复杂关系中,了解原作中的各种对话关系和人物的社会状况(可通过语言变体等识别),从而把握作品中的形象,这离不开译者的创造性。译者在新的语言文化环境下,考虑读者的接受基础创造新的

①黄宗廉在《变译理论》一书中对变译的定义是“指译者根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要求,采用增、减、编、述、缩、并、改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有关内容的翻译活动。”参见黄宗廉《变译理论》,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第96页。
欢迎访问重庆大学期刊社 <http://qks.cqu.edu.cn>

文学译本,构建和谐的新文本,这无疑是一种创造行为。每一次文学翻译行为都是一次创新,借用巴赫金的话说,是一次“唯一的、不可重复的事件”。

四、结语

综上所述,文学翻译是译者的审美再创造活动,文学翻译是译者在艺术的领域中进行语言艺术再创造,文学译者是文学译本的再创作者。文学译本中渗透着译者的审美情趣和精神力量,译作与原作形成一种对话关系,译者与作者也是一种对话关系。文学文本必须通过译者的表述才能在另一种语言环境中继续存活,文学原作在译者重塑文学语言和重写文学译本的艺术再创造中得以广泛传播和焕发出生命的光彩。

参考文献:

[1]黄振定.解构主义的翻译创造性与主体[J].中国翻译,2005(1):19-22.

- [2]钱钟书选集(散文卷)[M].海口:海南出版公司,2001.
- [3]童庆炳.文学概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149-156.
- [4]思果.翻译新究[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200.
- [5]郑海凌.译理浅说[M].郑州:文心出版社,2005.
- [6]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7]姚小平.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
- [8]巴赫金.文本、对话与人文[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 [9]哈吉姆.话语与译者[M].王文斌,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345.
- [10]巴赫金.周边集·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423.

The Creativity of the Literary Translator

ZHAO Xiao-bing, MA Chong-yu

(*Institut of Foreign Languages,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0, P. R.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reativity of the literary translator. Literary translating is an act of the translator's esthetic recreation, is the translator's recreation of linguistic art, the literary translator is the recreator of the translated literary text and the translated literary text is permeated with the translator's esthetic interest and spiritual power. The translator's artistic recreation of reshaping literary expression and the literary text enable the life of the original to live in its new linguistic environment.

Key words: literary translating; translator; esthetic recreation; reshaping of literary language; remaking of the literary text

(责任编辑 胡志平)